

教師生活六十年

高明

(本文插圖刊第43頁)

教書世家的小老師

由於先父、先兄都是做教師的，我自幼就生活在一個教師的家庭裏，所以我對於教師生活，早就有了一份熱愛。

我的教師生活可說開始於民國十四年，那年我十七歲，考上了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，私立鍾南中學校長喬一凡兄聘我去兼了一班國文課，那時的學生年齡比較大，有許多學生和我同歲，還有比我年長的，但他們對我這個「小老師」却從來沒有輕侮過，都懷着一顆敬愛的心，這就鼓起我做教師的勇氣來了。國大代表許振東女士就是那一班的學生，她和我同歲，又是我好朋友的太太，可是見到我，總是「高老師」叫個不停。在臺灣，她算是我最早而又最老的學生了。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後，國立東南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。民國十九年夏，我在中央大學畢業，到江蘇省立松江中學任教，教一班高二國文和初中史地。同事凌放廠學長（他是東南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範畢業的，所以我稱他為學長）是一位詩人，我和他同住一個宿舍裏，頗有唱和之

樂，我們時常共享尊鱸的風味，同尋華亭的名勝，有時還借去茶館，聽唱珍珠塔彈詞，那時我所過的教師生活真是輕鬆愉快極了。可是這並不能滿足一個青年人「志在四方」的欲望，民國二十年我鑒於東北情勢的複雜和危險，很想去看看，就應友人梅公任、曹德宣二兄的邀約，前往瀋陽任教，恰好遭遇到「九一八事變」，倉皇中，從瀋陽逃出，書籍、衣服、行李盡數丟失，隻身逃至皇姑屯，登上難民車，沒喫、沒喝、沒有睡眠，也沒法解手，整整三天三夜，時時在日本飛機的追逐下，總算逃進了山海關，逃到了天津。這才使我深深地體認到國防問題的嚴重，發願要研究歷代倭寇的侵華史實、沿海地區的國防形勢，以及古今中外的國防理論與策略，使我以後在教師生活中平添了一重精神的負擔，不能再過那單純的輕鬆愉快的生活了。

記得由天津回到南京的途中，在津浦鐵路的車上，經過蚌埠附近時，正逢中秋之夜，天上是一輪明月，鐵路兩旁則是汪洋一片（那時正鬧水災），一節車廂裏只有同行逃難的施起之兄（他是教英文的）和我兩人，空空蕩蕩地，一種淒涼

蒼茫之感，夾着內憂外患之愁，直襲心頭，不知不覺地「愴然而泣下」！此情此景，我是畢生難忘的！回到南京後，第二天就遇到喬一凡兄，邀我回到鍾南中學任教，教高二的國文。我的宿舍在學校的對面，學生來請益的，絡繹不絕，可以說是「戶限為穿」，青年們的熱情實在是太可愛了！有一個寒假，我因趕寫一篇有關國防的論文，沒有回家過年，家在南京的同學們恐怕我孤寂，輪流來陪我過年，在天寒地凍中，我的小屋裏經常圍着一羣同學，却有無限的溫暖。當我被上海附近南匯中學的校長好友秦蔓園兄拉去幫忙時，同學們都哭了，這是我的教書生活中永難忘懷的一件事。

東北歸來醉心國防

秦蔓園兄辭掉了校長的職務，我就被江蘇省立灌雲鄉村師範的校長李剛甫兄聘去任教，剛甫兄和教務主任那治平兄都和我在大學裏同學，他們讀的是教育系，而我讀的是中文系，但彼此都很熟識，因為我是以教育為輔系的，我們常在一起上課，後來又在一起共事，真是倍感親切。

灌雲是在隴海鐵路的東端，境內的連雲港和雲臺山都是國防的要地，也是遊覽的名勝。課餘，我常登山臨海，東望扶桑，想到日本人的步步進逼，真是憂心忡忡，研究國防問題的心情就更迫切，而發表國防問題的論文也就格外地多了。

也就因為我熱心於國防問題的研究，終於我竟穿上軍裝，掛上武裝帶（那時軍官的服裝都有武裝帶），做起江蘇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的主任秘書，但我還沒有完全脫離教師的生活，我還兼江蘇省保安幹部訓練所和江蘇中心民校校長訓練班的教官，為那些準備做抗敵的地方游擊隊幹部的學員們講「自衛新知」（是一部明朝人所寫的兵書，原名叫「游擊百金方」，對抵抗倭寇會發生過效力；在防衛現代的國土，抵禦日軍的入侵，仍然是有用的，因改名為「自衛新知」）。後來中日大戰江蘇淪陷，地方的游擊隊一直牽制著很多日軍，那時散播的種子總算是茁長起來，開花結果了。

一個目標 一個信念

抗戰初期，奉中央的命令，到西康去，為鞏固抗戰後方的基地，而工作了兩年，可說是完全脫離教師生活了。民國二十九年我到中央政治學校擔任秘書，三十年轉任國文教授，主編大學國文選（此書在正中書局出版，是大學有國文教本之始）。那時同教國文的有黃淬伯、徐英、穆濟波、蘇淵雷、王夢鷗、熊公哲諸先生，都是一時俊彥，從此我又回到了教師生活，不再改行了。直到現在，我已整整地做了四十多年的教授，回

想起這四十多年的教授生活，有時是在危險艱困之中度過，有時是在紛擾繁雜之中度過，有時是在顛沛流離之中度過，有時是在驚疑震撼之中度過，但是我認定一個目標（維護並發揚中華文化），堅持一個信念（中華文化必能毀滅邪惡的勢力，復興苦難的中國，挽救危機四伏的世界），永保一種心情（澄明寧靜的心靈和不憂不懼的情志），確守一種意志（努力不懈，百折無回），我不以厭不倦（孔子說：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。」）鞭策自己，我以至誠至公（中庸言至誠，禮運言至公）對待他人，雖然我在工作方面曾遭受過不少的挫折，但是我在學生方面却得到了無窮的安慰！

在中央政治學校時，日本飛機前來侵襲，炸平了我的宿舍，炸光了我的書籍、衣服和行李，我藏身在防空洞裏，僅以身免，同事們和同學們紛紛安慰我，我只笑一笑，說：「沒關係！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。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？那些東西算得什麼！」事後，我的生活雖然更艱苦一些，但是我沒有皺過一下眉頭，我依然高高興興地和徐英、陳家慶、虞文、胡一貫、王夢鷗、蘇淵雷……諸位吟友組織了一個「花溪吟社」，常泛舟於花溪之上，往來於南溫泉與小溫泉之間，作詩填詞，尋幽訪勝，頗似南社的風流，欲作中興的鼓吹；可惜為時不久，各有任務，也就風飄雲散了！

灌輸青年戰爭原理

民國三十三年，劉季洪兄被任為國立西北大

學校長，他約聘了蕭一山、藍文徵、高亨諸兄和我去任教。那時歷史系原有陸懋德、黃仲良等教授都很有名，再加上一山、文徵兩兄，一山是清史權威，文徵是隋唐史專家，陣容顯得十分地堅強；中文系原有邵祖平、張西堂、戴君仁諸教授，都是從北平退來的名角，再加上我們二高（高亨兄字晉生，是子學名家，我那時在文學界還有一點小名氣），陣容也顯得很整齊；所以別的院系有一點眼紅，說劉校長此來是專辦文史兩系的。我和一山、晉生同住在一個院子裏，我們三頓飯都在季洪家裏喫，共進共出的「三人行」很為全校所注目。後來一山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轅的秘書長，晉生又轉教四川，偌大一個院子裏只剩下我一個人，幸而同學們常來請教，系裏的同事相處得很和洽，尤其君仁兄和我常在一起下圍棋，往來尤密，所以我絲毫不感寂寞。那時西北大學是暫設在陝西省漢中區的城固縣，漢水邊是我經常散步的地方，風光明媚，極似江南，使我時時神往故遊之地，徘徊甚久而不能去。漢中附近一帶古蹟甚多，如褒姒的故居、石門的棧道、戚夫人的墓、張竊的墓、蔡倫的墓、曹操的摩崖、諸葛亮的拜星臺、馬超的墓……等，在課餘、在假期，都由同學們陪我去一一訪問，我似乎又重讀了周、漢、三國的歷史，懷古傷今，實在是感慨無窮！西京圖書館唯恐日機轟炸西安，將重要的圖書都遷到城固的鄉間，因此西北大學的師生——尤其文、史兩系的師生——能够盡量地利用這批圖書。我那時研究的興趣正集中在禮學，在城固的幾年，我把西京圖書館所藏禮學的

書幾乎都讀完了，這是我在西北大學教書時最大的收穫。可是我那時的生活並不完全是閒逸和寧靜的，由於戰爭情勢的迫切，政府號召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青年從軍的熱潮十分洶湧，西北大學的愛國青年也紛紛起來從軍，學校爲這批青年從軍入營前作一些精神準備，特請幾位精通近代史的教授爲他們分析這次戰爭的原委，並說明這次戰爭對民族國家存亡盛衰的重要性，以鼓勵他們的士氣；而我則爲他們講「中國戰爭原理——孫子兵法」，讓他們先具有一些軍事常識。誰知這次演講竟意外地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，掌聲不絕，而且要求學校增加我演講的鐘點：駐紮在南鄭的青年軍二〇六師師長方先覺將軍得到消息，也請我去演講，於是我以一個文學教授又兼任起軍事教官來了，這是我在城固的教師生活的外一章，也是可以一記的。

教書生涯的外一章

在抗戰末期，共產黨發動全國的學潮，西北大學自然也被波及。那時共黨的大本營是在陝北的延安，對近在肘腋的西北大學自然是不會放過的，他們控制了學生會，在社會上製造事端，如毆打公路站長、滋擾商店之類，迫使學校不能不管，學校一管，箭頭就調轉，對準學校當局，而軒然大波的學潮就掀動起來了。

在學生暴動的時候，城固一時陷入恐怖狀態。我那時看到這種局面，實在悲憤，就奮不顧身地攘臂而起，以系主任的身分團結各系主任，進而團結全體教授，以支持學校當局；又利用我在

學生中的影響力，組織護校團，與學生會對抗，僅僅一個星期，局面完全扭轉，肇事的學生都逃走，風潮徹底平息了，學校恢復了正常。

接着迎接抗戰勝利的來臨，西北大學正式遷置於西安，劉校長季洪兄延我爲教務長，直到季洪卸職爲止。在這段期間，我除了處理教務外，每逢週末假期，必與藝術考古室主任王子雲兄及其夫人何正璜女士，訪問西安周遭的名勝古蹟。

由於這個區域是周、秦、漢、唐首都的所在，古宮、古陵、古寺、古刻以及各種各色的古物，真是瞻之不盡，到處皆有；至如古錢、古俑、古磚、古瓦之類，更是俯拾即是，垂手可得。在這裏，我對於我中華民族生長發展的歷史不能不有無窮的嚮往，對於我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更有進一步的認識與愛好，我立志要傳播中華文化、發揚中華文化，就更爲堅定而執着了。

中央政治學校遷還南京，更名爲國立政治大學，成立中文系，我又應聘回來任教，在中山陵下廣闊的校園、巍峨的校舍裏，我住了一段時間，又因大局急變，開始度顛沛流離的生活了。先是應湖南衡山國立師範學院院長陳東原兄之聘，前往任教。衡山爲南嶽，明末大儒王夫之曾隱居在此山中，爲後世儒者所仰望；唐朝李鄴侯（名泌）嘗讀書於此山道觀中，是中唐輔弼中興的名相；唐代名僧懷讓禪師來居般若寺後，南嶽又成爲佛教的中心。此山風景幽美，名刹如林，課餘訪勝，殊多樂趣；最值紀念的要算偕張起鈞、黃金鰲兩兄同遊南嶽最高峯上封寺的那一次了，起鈞兄曾有文記此遊甚詳。我自入山後，頗有遁

入桃源之感。國文系同事馬宗霍、駱鴻凱諸兄又都意氣相投，如水乳之和融；同學愛我重我，請我演講，一次講文學鑑賞，一次講佛學奧義，反應都很熱烈。尤其青年軍復學和長白師範學院寄讀的同學們，他們都是反共愛國的青年，深悉我的立場，對我尤爲愛戴。當程潛變節，湖南易色的消息傳到南嶽，我和張起鈞、黃金鰲決計南下廣州時，同學們護衛着我們，依依不捨地送出校門；這份情意，我也是永遠不能忘懷的！

門下出了近百博士

由廣州轉到臺灣，我的教師生活又轉入一個新境界。初到時，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後來改爲大學，又改爲國立）任教。正中書局以臺灣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，中國語文和民族思想都被日本人摧殘得很厲害，就約我編一套當時臺灣適用的初中國文和高中國文，又以那時中學國文教師多半不是學國文的，我不得不對作者、題解、注釋、習題等寫得詳細一些，又附上語文常識，誰知後來竟成爲中學國文教本的定式。教育部爲實施民族精神教育，編一套初高中中國文標準本，我也是主編之一；國防部總政治部（後改爲政治作戰部）也約我爲各軍事學校編一部國文教材；對於復興基地國語文的推進和民族思想的傳播，我是貢獻過一些力量的。

從民國四十五年起，我爲師範大學創辦了國文研究所，爲政治大學創辦了中文系（指在臺復校以後的中文系），後又爲中國文化大學（原稱中國文化學院）創辦了中文所、系，又爲政治大

中學創辦了中文研究所。我在這三所兩系，造就傳播中華文化的幹部、研究中華學術的人才，不僅造就了數不清的學士和碩士，而且我支持了前教育部長張其昀曉峯先生建立博士制度的政策，現在統計在我國得到國家文學博士學位的約有一百五十人，其中半數是出我門下，受我指導或從我問學的。

最大力量得自學生

他們散布在國內外各大學裏，為傳播中華文化而努力，為發揚中華學術而獻身。我走遍臺灣各地，看到各大專學校裏都有我的學生，在為中華文化而默默地耕耘，心中的喜悅真是難以言說。我走到香港，走到新加坡，尤其走到韓國，看到中文科系的大學，都有我的學生親切地接待，知道我所播的中華文化的種子已在亞洲各地發榮滋長，更使我有無限的高興。

我今年七十七歲，已在公立學校退休多年，但我仍在研究、寫作和教學，甚至勞碌還超過我退休之前，我是一個「不知老之將至」的人，我對於中華文化是抱著一種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心情的人。是一種什麼力量能够使我如此呢？請看同門學長潘石禪重規兄壽我七十的詩中幾句話，就不難得到穀中的消息了。他詩中說：「……施教何殷勤？志業誠有寄。傷足偶示疾，軒翥困折翅。門人競趨踰，病榻遞扶持；周詳進飲膳，穢辱及踰廁。伏枕豐餘閒，羅列聽風議。問疾閒拜床，事師古有志。孰若多士多？魚貫復鱗次，教授成魁碩，博士逾十四。醫門即師門，累

月動候伺。旁觀為感歎，嗟哉孰能致！……」這是我六十九歲那年住入醫院的事，由此可知我之於學生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，這便是使我好教師生活至今不衰的最大力量！

民國七十五年的教師節快要到來了，我回想

過去，真不知有多少悲哀、愉悅和繫念！六十年的教師生活都過去了，現在我只希望我和我的學生們能把中華文化的光輝重新照耀在大陸，並進而照耀在全世界，我六十年的教師生活就不算白過了。

李品仙回憶錄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歷經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轉戰南北，閱歷閎富。著有「李品仙回憶錄」，翔實生動，包羅萬象，要目如后：武昌起義。回桂連絡。陸榮廷與廣西。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。機關槍長的故事。轉入湘軍服務。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。兩次危險的任務。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。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。唐生智與顧和尙。唐生智倒趙與北伐。先鋒變成後衛。武漢三鎮的光復。寧漢分裂與清共。北伐的最後一戰。編遣會議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。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。抗戰開始率師出征。京滬棄守。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。武漢保衛戰。武關道上。隨棗會戰。重回大別山。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。戰時皖政實施紀要。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。皖南行與立煌事變。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。邊區雜憶。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。日寇投降。隨勝利上演的悲劇。安徽的復員與接收。空城計。戡亂戰局逆轉。大陸淪陷。林泉息影。